

不要用情绪代替行动

张欣

很久以前看过一篇短文至今都没有忘记,是说有一个人家里出现意外失去了亲人,他的朋友都到家里来安慰他,不少人流下泪水。只有一个朋友进屋后看到家里出事的主人的家门口堆着若干沾满污泥黄土的鞋子,肯定是因为奔波劳碌没空打理。于是他找到鞋刷和擦布把所有的鞋子整理干净,排齐之后就默默地离开了。这篇短文一直提醒我遇事要多想一想我能帮助别人做什么。

有一次我和朋友加班晚了,就近去她家吃点东西。见面,她妈妈就唉声叹气说你这么怎么这么辛苦。我好想说,能不能先下碗面条给我们吃。当然后来也下了面条,就是我发现我们的思维模式常常是先要表达情绪,或者先表明立场。

遇到问题也是,我不高兴了,所以这件事我完全没有办法完成。我年轻的时候就犯过这个错,因为情绪波动把朋友交办的事搁置不理从而失去了这个朋友。后来拼命解释当然也无济于事。

就是情绪上头完全失去理智。其实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执行力的问题,为什么有的人才华平平但是进步得特别快,就是这个人脑子里始终有一根行动线,一定是先分拆步骤然后逐个解决把事情办成,而不是情绪激奋,没有然后。

仔细想一想,是不是太多的人在办公室,在饭桌上说得天花乱坠,到了具体落实的阶段他们是没有一个靠得住的。如果我们是这样的人,就不要埋怨领导不重视自己如何怀才不遇,朋友不喜欢自己渐渐失联,因为这是非常致命的缺点。

我有一次生病实在没有力气去医院,想到很多朋友都不合适,因为大家都忙,都是手上一摊事。于是弱弱地问一个平时联系并不紧密的朋友,她一口答应说,我陪你去,然后说几点在哪里等我。我当时内心非常感动。我会更珍惜那些在关键时刻出手相助的人。

很多人是有善心的,然而把善心和情绪转换为行动才是最难的。



新的一年到来,很多人都在线上总结旧年、祈福新年。可新年都被我这个老家伙过旧了,还有话说吗?那就算算日子的流水吧。

日子

曲令敏

上午跟儿子出去买鲫鱼,才知道小孙子的新生儿补贴真不少,比她母亲产假六个月的工资多出一大截儿。单位让二选一,如果产假期间照领工资,就不能要补贴。算算工资远没有补贴多,就选了补贴,一次性领取,再加上满月的红包,买了一辆新能源汽车。连带着充电桩、保险,不小的一笔费用。灵活就业的儿子一直在家里陪孕、陪产、陪带娃,这么一来,一应花销都压在了我的退休金上……我把自己的鼻子的手术推迟到春节后。小儿子说,我跟哥哥说好了,他明年回来陪你吗?一句话把我心上的大石头掀掉了。原来各种压力山大,都是我的穷人思维在作怪。都啥年代了,还这么抠,小病拖成大病,不是傻了么!日子哪怕真到了像在钢丝绳上骑自行车,你只要两眼紧盯钢丝绳,忽略所有的坑和坎儿,就能顺利过关。

巴菲特说:“不是你的能力决定了你的命运,而是你的决定改变了你的一生。”常识是:“力气是奴才,不使不出来。”真理一样的常识是:怀一颗坦荡温软的心,只管给,给,给,万千花果就在那儿。不难为自己,不计较他人,把敏感用在写字上,家人之间必须钝感。爱只要足够,啥矛盾都能平息,小日子就会和畅。

感恩儿子,把我当小孩子呵护,早上摸摸头,拍拍脸,叫我起来吃早饭。晚上十点,准时把平板收了,藏起来,让不自律的老人家按时睡觉。再想想我在场面上穿的好衣服,哪件儿不是儿媳挑的?眼前虽然遇到了低谷,家庭重担压在我身上,这不也是一种福气和底气吗?再想想,小孙子一天一个样,白白胖胖的,这是谁的功劳?

儿媳是外姓人,怀胎十月,辛辛苦苦生出你的小孙孙,让衰老的生命有了嫩芽,这是多大的恩德啊,哪有啥好计较的!你只管心怀希望往前走,什么泥沙俱下,什么坑坑洼洼,一掠而过,都会变成文字的金沙,变成万物生长的春天。



春暖自若一路花香
篆刻 姚善恩



不尽春消息
篆刻 袁国强

时逢“三九”,天寒地冻。我“孵”在家中翻阅旧书信。突然,萧乾先生的一封信跳入眼帘,信封邮戳是1993年3月3日。我抽出信纸看后,猛然想起多年前的往事。

1990年,我邀请萧老写的文章《永恒的上海——沪滨漫忆》在《上海滩》杂志发表后,得到许多读者好评;但也有一些读者提出,当年萧老居住在上海环龙路(今南昌路)的事写得太多,希望萧老再写一篇“环龙路往事”。我有点为难,因为,当时萧老已年逾八十岁,身体不太好;不久前又新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非常繁忙;还得抓紧时间著书译书。据说,那部英国小说《尤利西斯》非常难译。之前,他曾来信说已经没有时间为报刊写稿了。不过,我还是希望萧老能写下那段珍贵的“环龙路往事”。于是,我斗胆给他老人家写了一封约稿信。

不出所料,萧老好长时间没

有回信。我曾经想写信催稿,但最后还是忍住了。就在我准备放弃时,萧老的信来了!我太高兴了,赶紧拆开信一看,起首写着“昆元兄:示悉。”之后,没有任何寒暄,直接写道:“1936年,《大公报》出沪版(津版仍照出),我被调到上海兼编津、沪两地《大公报》的‘文艺’副刊,就住在环龙路(好像是吕班路口)。那里离‘法国公园’(注:今复兴公园)很近。同在一个路口的还有《译文》编者黄源和他的妻子许粤华。”接着萧老又写道:“我记得环龙路与霞飞路是平行的。当时,巴金、靳以等许多朋友都住在霞飞路的弄堂里。我最初也住过。二房东是个白俄女人(见我的小说《黑与白》)。后来,杨朔和孙陵(二人是从东北来时搭档)合办一家‘北雁出版社’,租下那幢环龙路

有段时间,麻雀列在“四害”第一名。后来又把麻雀从“四害”中剔除,用臭虫代之。怎么回事?

过了很久才略知一二。1957年1月30日,华东师大张作人教授以中国动物学会上海分会理事长的身份发表了《对麻雀问题提出一点参政意见》的文章。他认为之所以把麻雀列为“四害”是说它吃种子。其实麻雀主要吃虫,其次吃种子。表面看它吃种子,殊不知麻雀还能传播种子。他的结论是应对麻雀适当控制而不是彻底扑灭。继张作人之后又有两位科学家表态“反对全部消灭麻雀”。他们不赞成把麻雀列为害鸟的建议,得到相关领导的肯定,“麻雀不要打”。张作人知道后欣慰地说:“并不是替麻雀高兴,而是对‘麻雀问题’进一步采取谨慎周密的科学态度,这是科学上值得庆幸的一件事情。”

从此以后,我对张作人肃然起敬。出于对张作人的敬佩我不断打听张作人的情况。方知他曾任中山大学、同济大学等四所大学的教授。值得一提的是他早在24岁时便在上海大学当教授,年龄比有些学生还小。他不仅是出名的动物学家,而且学识渊博,满腹经纶,书法也很好。

1972年,我有幸加入华东师大的自然辩证法组,住在丽娃河边,这给了我向张作人教授讨教的机会。有一天我与张教授相遇,立即把他请进我那7平方米的小房间里,称他为“麻雀救星”,对他说是我从农村走出来的,抓住麻雀,吃下麻雀蛋。他笑着说他也是从泰兴农村来的。接着他便侃侃而谈。大意说了以下几点:首先麻雀是最接近人的鸟。“百鸟之中最活跃,身姿灵巧窗边落”。其次,麻雀既不怕热,也不怕冷。“最是林中情义鸟,枝繁枝尽总开喉”。麻雀比候鸟更有适应性。最后就是,麻雀是赖群体互动而生活的。“身无系累之患,处无离析之悲”。如果把它关进笼子里,体重马上下降,很快就会死掉。它是真正的“不自由,毋宁死”。麻雀的救星也是我的老师。

中涵烟霞气

戴蓉

藏,常被油炸制成油鸡枞。面汤或凉拌蔬菜里,只要加入一勺油鸡枞,野生菌特有的森林山野之香萦绕不散。其实江南也有好菌子,有一年去无锡鼋头渚赏完樱花,沿山道拾级而上,穿过茂林修竹,去广福寺吃了一碗“盖浇罗汉面”。面是苏式面,浇头有香菇、笋、木耳和豆制品,汤底清鲜。友人曾给我发过一张常熟兴福寺草

油面的照片,面的浇头是产自虞山的松树蕈。虞山多松林,松树根部附生的淡棕色野生菌便是松树蕈。那碗蕈油面泛着诱人的油光。

康熙年间的吴林写过一本《吴蕈谱》。他把苏州山里的二十六种蕈子分为三个品级,上品描述天花蕈、松花蕈等珍稀品种“味极清美”的特质,中品记载雷惊蕈、胭脂蕈等中等品种的采集时节与烹饪方法,下品则收录土菌、茅草蕈等常见品种的储存加工技巧。春气初萌,雪化后泥土变软,雷声欲响,这时节出产的蕈就叫雷惊蕈,黑色的雷惊蕈叫乌雷惊,黄色的叫黄雷惊。菜花时节生的蕈叫菜花蕈。梅树下的是梅树蕈,茶树下的是茶棵蕈,桑园里的是桑树蕈。形状像鹅蛋的叫鹅子蕈,小于鹅蛋的叫黄鸡卵蕈。颜色赭紫、味道甘甜的称为糖蕈……真是绘声绘色。

江城子 登蟾峰阁次东坡韵

松庐

江亭吟罢立苍茫。枉论量。总相忘。还愧单衣,朝暮幻凉凉。隔岸芦花吹更白,斜月映,有微霜。望中曾是水云乡。碧烟窗。醉红妆。浪闻星孤,更问向谁行。洒落情怀知所寄,萦紫处,翠崖冈。

萧乾来信

葛昆元

里,肯定住过什么影剧界人士。我只记得有孙维世。她住在我后面一幢楼。”

在信中,萧老还颇有感情地写道:“那时,我几乎天天在大马路(注:南京路)大东茶室与巴金、靳以会面。泡上一壶茶,叫上什么点心,可以呆上大半天。有时,孟十还、黄源和黎烈文也去。我们都是由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的著译者。我还带进杨朔、严文井等几位在我主编的《大公报》‘文艺’副刊开始写作的友人。”“当时的大东茶室既是我们的会议厅,也是文稿的‘交易所’。我经常把收到的一些质量高而篇幅太长的稿子转

给他们编杂志的,他们也随时将手头的一些很有前途的新人短稿转给我。有些,我还再转给在武汉编《武汉日报》‘文艺’副刊的凌叔华。”

在信里,萧老还谈到了搬离这幢楼的原因:“我是由于在法国国庆日(霞飞路上灯火辉煌)的晚上,从一辆汽车底下救出一只伤猫,带回家来替它治疗并养了下来。一次,它溜到白俄房东太太屋里撒了一泡尿。那房东太太跑到我屋里,大肆咆哮,并逼我要把猫立刻丢掉,要么立刻搬走。我就搬走了。”其时,恰逢“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不久,萧乾夫妇“就从环龙路离开上海坐船到内地去了”。萧乾先生的这封信,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补充了一份非常珍贵的史料。

十日谈

飞鸿往来

责编:郭影

安德烈·纪德非常钟情电影院。有一阵子,天一擦黑,他就悄然而郑重地出发——围个大围巾,带着羊毛毯——潜入影院。看此画面,你是不是觉得他并非非是去看电影,而是去睡觉的。猜对了,当影院关灯,剧情展开,他将围巾、帽子取下……我猜要是前后左右没其他看客,他一定会舒舒服服躺下去,将毛毯连头蒙上。随着银幕上的恋人絮语、仇敌厮杀,进入迷人的梦乡。影片结束,他穿戴整齐走在街上,华灯初上,他半梦半醒之际听到电影里的一句对白,激发他写出一句:我生活在妙不可言的等待中,等待随便哪种未来。

哲学家维特根斯坦也是电影院的常客。然而他看电影的“模式”很怪。据他剑桥大学的同事回忆,他进入影院安坐好后,总是朝前探着身子,紧绷着,一动不动、目不转睛地看着银幕,仿佛并非来放松,而是来受罪!但,不是的,维特根斯坦每每进入影院,总是选择坐在最前面一排,这样银幕就占据了整个视野。有一回他和弟子们说了一句,这真像一场痛快的淋浴!一个欧洲导演回忆,二战期间他还是个少年,除了看电影没有别的事。每天,他紧随着成年男女进入影院。他有个同学的母亲是影院清洁工,同学告诉他,每天电影散场,他母亲总会扫出很多避孕套。战争期间,人们经历着恐怖、流亡和抓捕,时时刻刻都要面临和亲人、伴侣的生死离别。极度苦闷、空虚、险峻、无望时,人们只能寄托于性。于是在黑漆漆的影院里,一段段乱世情缘也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加西亚·马尔克斯做记者的年代,有一桩电影院怪事他想查个明白。一位衣着考究的老者,多年下来雷打不动,每天必看下午场。散场后,一辆小汽车在门口等他出来,将他一溜烟载走,比电影落幕更快。此人是谁?一个每天来影院“取经”的失业导演?一个匿名影评人?一个“黑道”人物,每天坐镇漆黑当中,给手下布置不可告人的任务?倘若这些都不是,那他一定是位超级影迷!进入影院后,老先生安静观影,不嚼口香糖,不吃爆米花,不到银幕上出现“剧终”两字绝不抬屁股走人。他似乎无比虔诚地热爱着:卓别林、嘉宝、加里·库伯、艾娃·加德纳、亨弗莱·鲍加、玛琳·黛德丽……后来通过采访,马尔克斯得知,老先生不是导演、影评人、黑社会大佬,甚至他连一个影迷都算不上,他只是片食品店的老板,“这十几年来,我只是按照医生的建议,啥事不想,来看个下午场。”

从电影院出来的人,和从车站、写字楼、咖啡馆、公园、饭局、KTV、按摩房、书店……任何地方走出来的人完全不同,他脸上呈现出一种慵懒的幸福感和一种超现实般的秘密愉悦,这跟大街上千篇一律的——面无表情、匆忙赶路者形成强烈的反差。尽管他表情里有种迷路的感觉,但脚步又是轻盈的,他似乎不太情愿从刚才那个美梦中走出,回到没什么悬念的现实里。但是,等一等,你看,电影里没有发生的,在大街上上演了!

王世襄在《春菘秋蕈总关情》写过一位服侍外婆的老奴,“她每年深秋,都要从家带一瓮‘寒露蕈’来,清油中浸渍着一颗颗如纽扣大的蘑菇,还漂着几根灯草,据说有它可以解暑。这种野生菌只有寒露时节才出土,因而得名。其味之佳,可谓无与伦比。”这位农家妇女来自洞庭东山。这篇文章里还写到了湖南的野生菌和长沙街头小馆的蕈子粉和蕈子面。去年初秋我到长沙参加笔会,美食达人小雅带我去一个居民小区吃粉。她推荐我吃刚上市的“寒露炖肉粉”。浇头里小巧的蕈子极鲜美。后来我查了资料,“寒露”并非一个严格的生物学分类名称,而是中国南方部分地区民间对一些野生食用菌的俗称,特指一类在秋冬寒冷季节生长的、可食用的菌菇。其中最常见就是松乳菇。松乳菇主要生长在松树等针叶林或混交林的地上。看来,这寒露和蕈油面里的松树蕈有异曲同工之妙。

《春菘秋蕈总关情》开篇写到了宋人汪彦章的食蕈诗。“戢戢寸玉嫩,累累万钉繁。中涵烟霞气,外绝沙土痕。下箸极隽永,加餐亦平温。”生于腐土和雨水的菌子是大自然隽永的诗篇。

人生理想

夏春锦

木心的人生理想有三,一是不工作,二是没人管,三是做个单身汉。他把这些理想视为是鸟兽的境界,它们既不像人一样工作,也不受同类的管辖,独飞独奔,可以随心所欲,获得了大自由。